

贸易的古典自由主义逐渐确立其在经济学中的主流地位，这可以解释为核心国家在全球经济中处于结构性优势的反映。但从历史上看，即便是荷兰、英国、美国这三大依次主导世界秩序的霸权国家（核心中的核心），它们在攀上权力巅峰的过程中也都长期推行以牺牲他国经贸利益为代价的重商主义，而一开始就被诱入自由贸易陷阱的国家则不幸沦落到依附性的地位。冈德·弗兰克（A.G.Frank）曾用“美洲派”与“欧洲派”之争来描述19世纪中期拉美地区围绕经济发展道路的分歧。“美洲派”希望实行贸易保护主义，以保护脆弱的正在起步的本土工业。“欧洲派”提倡有利于大土地所有者的自由贸易，这样后者就可以继续把农产品输出到欧洲国家同时获得来自对方的更高端的工业产品。总的说来，“欧洲派”赢得了胜利，这体现了西班牙在拉美植入的封建庄园制的经济社会结构，也是前殖民地在摆脱了对于宗主国的政治依附之后仍无法摆脱经济依附的典型案列。相反，革命后的美国面对大英帝国的工业倾销坚定保护它“刚诞生的工业”，为此不惜与“欧洲派”的南方奴隶主开战（南北战争）。可以更一般地说，“美洲派”走的是经济发展中的去边缘的路径，“欧洲派”则代表了维持甚至深化边缘现状的路

右图：西班牙入侵美洲，四处掠夺。



径。二战后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亚洲国家也经历了追随西方全面开放市场的阶段，意识到此路不通后才决然转型由国家保护的出口模式，并最终取得成功。而一如既往地迎合国际市场将矿产或石油出口专业化的拉美，在新一轮反对贫困和政治动荡的斗争中失败了。

采掘业（包括石油开采）是全球化在产业分工上对拉美的基本定位。而一个长期依赖资源型产业的社会几乎肯定是腐败的，因为接近矿产资源的前提是接近权力并诉诸暴力。而暴力机制一旦形成，它就无法消除，只能转化。曾与“哥武”作战的哥伦比亚士兵，脱下军装就转入麦德林的城外森林中从事武装贩毒。秘鲁士兵在同“光辉道路”的作战中浴血冲锋，复员后又在瓦亚加河谷为毒品走私保驾护航。拉美出产毒品的地方，正是历史上向

西方输出白银的地方，如哥伦比亚、秘鲁、玻利维亚和巴西。这不只是地下资源掏空了，所以转向地表资源谋生这么简单的事，它还形成了某种巨大的历史性的对喻和报复：白银是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动力，毒品则是消费时代的精神象征——它是对人自身及其官能的消费。拉美通过输出白银加以建构的那个世界，现在又通过输出毒品把它解构掉。

艾利斯·阿姆斯登总结了后发国家在启动工业化时所面临的一系列悖论：既要降低利率来拉动投资，又要提高利率来增加储蓄；既要低估汇率来鼓励出口，又要高估汇率来降低外债支付成本；既要保护本国新兴工业免受国际竞争的冲击，又要打开海外市场来满足进口的需要。要从这些悖论中杀出一条血路，后发国家必须抛弃自由贸易和开放市场的意识形态，推行干预主义的市